学术专论

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看清前期边疆管理中之青海地位

贾 宁

[摘要]《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的现有研究，多专注于清朝、准噶尔和西藏三方面之关系。若把对青海的关注放置于对《熬茶档》的解读，则不难发现乾隆朝准噶尔三次熬茶程序在青海的进展，决定着进入礼佛目的地西藏的成功与失败。如果说乾隆朝的准噶尔熬茶促成了清代藩部体系的最终形成，西宁管理中心和青海接待要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熬茶档》详实的记载展示着青海在清代边疆事务中关联各路、统辖四方，又在地域、行政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准噶尔熬茶 理藩院侍郎玉保 西宁办事大臣 东科尔贸易 青海学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0)－03－0025－017

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下简称《熬茶档》)，全面展示了起自乾隆五年(1740)五月至乾隆十三年四月间久藏宫闱的乾隆年间准噶尔进藏熬茶之珍贵档案，于清廷与准噶尔关系、清代蒙藏民族关系研究之特殊贡献自不言而喻，目前对之探讨的主要成果也顺理成章地着眼于清、准、藏三面之交。[①] 本文提出对《熬茶档》解读的另一结论，即清代藏事种种多系挂青海，蒙藏关系事事常赖以西宁。如此探讨青海角度的熬茶史，着眼于扭转青海历史的专题研究往往被纳入周边蒙、藏、回、汉各主体民族研究范畴的状况，也是对本人以往之倡议的强调，即青海与周边各方的民族研究既根脉依依又枝叶纷纷，同蒙、藏、回各区域学科一样，青海研究独具一格，自成一体，有其特定地位。[②]

[收稿日期] 2019-12-07
[作者简介] 贾宁，女，美国中心大学(Central College)历史系教授；chian@central.edu

① 代表性著作有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第十二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吕文利：《乾隆十二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吕文利：《由乾隆初年准噶尔三次入藏熬茶看清朝藩部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M. 乌兰：《准噶尔汗国对1717年事件的道歉》，《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另有探讨乾隆年间准噶尔熬茶大背景之吕文利文：《乾隆前期(1736—1750)的清准贸易——以价格、贸易方式的博弈及其影响为中心》，《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3期。

② 贾宁：《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贾宁：《"青海学"刍议》，董建中译，《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一、青海在准噶尔熬茶事件之时间、行程和管理上的关键性

对准噶尔三次以不同理由奏赴藏礼佛之请，[1]乾隆帝在朝野上下对准噶尔“极为诡诈”[2]“向来不可凭信”[3]之警觉中，权衡利弊，成其所愿。本文把准噶尔熬茶三至青海、两赴西藏视为一项整体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并认为唯青海走顺才入藏有望的事实都可以在《熬茶档》中得到反映。

行期定在乾隆五到六年的准噶尔首次熬茶之举，在距离西宁八十公里处的东科尔（今天青海省湟源县境内）进行了长达四个月又二十五天的贸易交换（四月初一日抵达，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哈密）。[4]虽然准噶尔此次半途断念，未赴西藏，却凸显了青海在熬茶事务中的前站地位。行期在乾隆八年到九年的第二次准噶尔赴藏熬茶，在东科尔的贸易自六月初至九月初持续三个月，入藏日期从十月初三日抵藏到十二月初五日起程返回，礼佛共计两月零两天。在准噶尔进藏前留驻青海期间，朝廷与乾隆帝钦差驻西宁之理藩院侍郎玉保及军政参予各方，周密统筹，精心规划，使准方的各项准备和藏方的各项防范措施皆安排到位，确保了熬茶使团进藏的条件。[5]成行于乾隆十二到十三年的第三次准噶尔赴藏熬茶，在藏时间长达四个月（十一月二十日至翌年三月二十日）之久，在这之前为进藏作准备的青海贸易和礼佛活动，于得卜特尔、西宁、东科尔诸地进行了一个月又二十五天（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三日），[6]使规模可观的准噶尔三百人熬茶礼佛得以顺利进行。总计准噶尔三次在青海大规模贸易天数为九个月二十天，比在两次入藏礼佛六个月加两天的时间多出三个月十八天（均不计在青海、西藏路途时间）。故青海于熬茶整体事件中，时间长度超过西藏。

驻藏大臣纪山“惟西宁青海至藏”[7]之言，驻藏大臣索拜“由［柴达木西北］噶斯路至西宁东科尔地方贸易，由彼前往西藏”[8]之语，都指出了青海在准噶尔熬茶地理路线上的关键性。西起主要站地乌鲁木齐的准噶尔熬茶使团进入哈密后，便有清护卫军全程“伴送”，直至事毕离藏。参加熬茶管理军护部分的地方要员皆集聚西宁尽职。以在第一次熬茶中权重赫然并在第二、三次熬茶中与钦差玉保紧密合作的凉州将军乌赫图为例，虽然他对熬茶的护军职责起自甘肃，延至藏区腹地，但却重在西宁，并得到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巴灵阿的直接辅佐。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乌赫图在奏折中称，“臣于本年二月初八日率领官兵自凉州起程，于是月十四日行抵庄浪，十六日率带庄浪之官兵，二十一日行抵西宁。因尚无准噶尔人等抵达之消息，臣于西宁地方歇养马畜，滞留八天，至二十九日会同［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臣巴灵阿率带官兵，于是年二

---

① 有关三次准噶尔熬茶简述，见《熬茶档》，郭美兰“前言”。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第 2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③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学士庆复奏闻前往庄浪等候玉保消息折》，第 1205 页。

④ 史料基于《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第 23 页；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第 99 页；乾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第 235 页。第一次熬茶整体过程参见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有关与熬茶东科尔贸易，见《访谈吕文利“清朝对外贸易亏本，皇帝真的不算经济账？”》，澎拜网站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0153，发布日期 2016-07-23，访问日期 2020-02-16。

⑤ 史料基于《熬茶档》上卷，第 415 页；第 299 页；第 311 页；第 343 页；第 395 页；第 413 页；第 473-474 页、第 491 页；第 513 页；第 523 页和第 541-543 页；第 591-594 页和第 795 页。

⑥ 史料基于《熬茶档》下卷，第 1009 页；第 1223 页；第 1243 页；第 1297 页；第 1305 页；第 1317-1378 页；第 1329 页；第 1337 页；第 1497 页。

⑦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第 25 页。

⑧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设卡防范并饬令郡王颇罗鼐备办防范事宜事》，第 293 页。

月三十日行抵东科尔地方。俟准噶尔人等抵达东科尔，臣等再另行奏闻。”[①] 故准噶尔第一次熬茶，虽然朝廷倾注于如何应付进藏后的局面，而实际程序和运作皆在西宁与东科尔。

准噶尔使团自哈密东进到青海西宁和东科尔后，停途歇旅，休整人畜，领取接济，投身贸易，从事藏前礼佛，养精蓄锐赴藏。准噶尔入藏后，布施前后藏各大庙宇，祈求喇嘛祝福，是为熬茶礼佛。布施的财物包括金子银两、哈达袈裟、经板燃灯、碗瓶伞镜、蟒缎布匹、毡褂垫包、七珍八宝、各类皮张、鸟枪银棒、翎冠幡刀等等。[②] 获得布施财物的途径则是将随身携带之牧群和腹地特产，在路途中以贸易方式交换，西宁和东科尔便是贸易重站。第三次熬茶添加的得卜特尔卡伦贸易场所，[③] 并未改变西宁和东科尔的贸易地位。加之西宁周边重要佛寺庙宇，多次成为准噶尔入藏前之礼佛场所，在青海的佛事活动实际成为熬茶礼佛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熬茶档》记录的准噶尔熬茶使团在青海的各类活动，反映了西宁一带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接洽功能。对准噶尔来说，这里既是换取进藏熬茶布施器物的经商之地，又是经长途跋涉后喘息滋养之地，更是使团对清朝内情亲临观视，择机条陈，磋商谈判之地。[④] 对清廷来说，准方出其不意的重大要求通常在此处提出，艰巨的斡旋对应落在了以玉保为中心的青海官员身上，他们上下沟通，筹划对策，以西宁地区连通并疏导准噶尔赴藏的准备工作。可谓不略青海，入藏无途。

强敌准噶尔入藏熬茶，乾隆帝“甚是担心”，[⑤] 对熬茶管理处处关怀备至，对准噶尔行程时时警惕不测。虽然准噶尔熬茶礼佛的最终目的地是前藏后藏，但入藏前漫长的熬茶旅程和迫切的路途商贸，使西藏既不是唯一的管理中心，又不是时间上的第一机要之地。相比驻藏办事大臣职责不出藏之状况，玉保为首的西宁管理网前接哈密至甘青之漫长一路，又事西宁、东科尔一带之接济、磨合、周旋、筹划多种政务，后而亲率准噶尔熬茶团队遥遥入藏，到藏后再“与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傅清等共同商议”行事，[⑥] 直至准噶尔使团熬茶完毕，送出管辖之区。对此，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描述如下：“所有［青海］设卡驻防、迁移蒙古游牧等务，令钦差侍郎玉保及所派员弁事先启程前往西宁，会同该副都统商议，办理妥当后，玉保率带员弁迎至卡伦地方接应使臣等，由驻卡守候三百名绿营兵官兵内，留下足敷照看使臣等所留人畜之人，由索伦、乌拉齐侍卫章京内酌留一员，会同绿营官员看守外，率带其绿营兵伴送至藏。事毕送出界后，再行返回。”[⑦]

综上所述，青海稳则全局安，西宁壅则全局乱，清廷熬茶管理，青海先于西藏。朝廷命官玉保坐镇西宁，政务繁重至极，统理着熬茶事务的方方面面。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第 91 页。这里使用目前行政区划的甘肃概念，准噶尔熬茶时期的青海在当时的甘肃辖区之内。

②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八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赴后藏熬茶事毕折》，第 1713-1715 页；乾隆十三年四月初日《侍郎玉保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进献各寺庙物件布施银两数目折》，第 1853-1859 页。

③ 位于柴达木西北部噶斯地方大路之上，为西南走藏、东南通青海西宁之重要驻防地。见陈柏萍：《康熙雍正时期青海驻军考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④ 史料基于《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第 63 页；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第 81 页；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第 247 页；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报准噶尔进京使臣行抵哈密事呈军机大臣文》，第 1351 页；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寄谕大学士来保著办理准噶尔使臣等接驾事宜》，第 1357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寄谕理藩院侍郎玉保法会期间暗加管束瞻拜人等勿令准噶尔人等发觉生疑》，第 1233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寄谕侍郎玉保法会期间暗加管束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等发生疑惑》，第 1233 页。

⑦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办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第 933 页。

二、熬茶进程中西宁在西部边疆事务中枢纽地位的确立

清朝对熬茶的通盘管理，中央层面由乾隆帝亲自督阵，军机处、理藩院、兵、户等各中央要部直接运作。在地方上，钦差大臣设置在西宁这样的枢纽地上，都是在熬茶过程中依现实需要而形成的管理体系。

清廷之第一次熬茶政务，在中央集于诸位军机大臣，以拟定对准噶尔策略为主；在地方专责于驻藏大臣纪山，以防范准噶尔在藏不轨为主；沿途护卫之责委以“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凉州］将军乌赫图”,[①] 以一路军事安全为主；朝廷所派护军，由“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阿喇布坦……自哈密接管使臣等，前来东科尔”。[②] 查阅三十二件关涉第一次熬茶奏折目录，竟无一件标题提及青海、西宁。但以奏折内容计，却只有六件没有直接提到青海、西宁、东科尔、塔尔寺或西宁军政人员。以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第一件纪山的奏折为例，“驻西宁大臣等先经奏准暂由藏监管之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此等番众“原系逆贼罗布藏丹津所属”，必与准噶尔使团隔离。再，“军机大臣等议得，准噶尔使臣入藏时，途经青海西边一带地方，其众蒙古游牧如何即刻迁移及防守……核定准由何路行走后具奏”。[③] 以上两点都说明熬茶管理中边事安全的重点首在青海。人事安排中，正在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的驻西宁副都统巴灵阿跻身于陕西总督、四川巡抚、凉州将军和驻藏副都统等协理熬茶事务重臣之列，[④] 此后西宁办事大臣在历次熬茶中均遵此惯例。

更为重要的是，西宁是为朝廷派出之各方熬茶管理团队和护军官兵的聚集地，亦是熬茶职责完成后所有军政人员的集散地。[⑤] 每次熬茶，朝廷“遣派大臣、章京、领催等由京起程前往西宁”,[⑥] 朝廷派出之满洲、蒙古和索伦等护卫官兵亦前赴西宁集结。熬茶完毕后他们自西藏“由原路遣返”回京前，均先到西宁整装调适。[⑦] 在西宁，侍卫达赖之政务设定为“照料准噶尔使臣等由西宁东科尔起程前来［西藏］”。[⑧] 这种低级别朝廷命官的安排，是原本以地处熬茶目的地西藏之驻藏大臣和地方郡王颇罗鼐为中心、青海和其他周边地区为辅佐的朝廷意图和管理格局的一部分，在第二次熬茶时得到调整。朝廷首先大大升格了向西宁所派钦差大臣之级别，由第一次熬茶管理中几乎默默无闻的郎中阿喇布坦，变换为乾隆帝钦点、位高权重之“照看准噶尔使臣等理藩院侍郎”玉保，[⑨] 准噶尔使臣称其为“大皇帝钦差承办我等前往西藏事宜之人”。[⑩] 管理的中心也随之改变。准噶尔入西藏前的多扣环节在历次熬茶中一直由甘肃巡抚、川陕总督、安西提督、哈密提督、凉州将军、黑龙江将军、察哈尔总管、土默特总管等倾力参助，其中凉州将军乌赫图在第一次熬茶时在处理军机、率官兵陪护准噶尔使团自甘肃经青海入藏、洽谈准噶尔突发性要求等方面尤显权重。第二次熬茶时，乌赫图军职照旧，但对于西宁与东科尔地区的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第 221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第 247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第 25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照请办理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官兵口米片》，第 45-46 页。

⑤ 《熬茶档》上卷，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第 263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第 935 页。

⑦ 《熬茶档》上卷，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军机大臣奏请赏赐由藏返回途中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片》，第 783 页；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第 263 页。

⑧ 《熬茶档》上卷，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赖在藏病故折》，第 777 页。

⑨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寄谕侍郎玉保著详细奏复准噶尔人等有何疑虑》，第 1167 页。

⑩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第 343 页。

贸易、安顿先期熬茶等要务以及入藏后各项事宜，降至辅助玉保的地位。第三次熬茶，准噶尔路途护卫权则全部移交玉保，凉州将军不再领衔。集中于藏庙礼佛事务的驻藏大臣和地方藏官，与到达西藏后的玉保亦变为协作关系。

乾隆八年第二次熬茶伊始，玉保就起调“所派官兵均于三月二十六日始陆续起程”,① 他本人亦“四月初二日自西宁起程，于是月二十六日行抵得卜特尔卡伦”迎接准噶尔使团。② 他接收哈密提督文书，迎候准噶尔使臣到达，照料卡伦防护军务，调遣西宁绿营官兵，指导东科尔贸易备办，给换准噶尔行旅马驼，安置滋养牧群兵丁，③ 联络藏方接待，交涉入藏日期，应对不测要求，周旋棘手事宜，对上奏报皇帝，对下咨文施策，紧密接洽凉州将军乌赫图、川陕总督马尔泰、甘肃巡抚黄廷桂、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西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和藏方郡王颇罗鼐等等，统筹全盘，集诸务于一身。④

熬茶起始时，军机处对地方就熬茶事务的咨文路径通常是“军机处咨行驻藏副都统傅［清］、办理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衔众［佛保］、伴送准噶尔赴藏熬茶使臣等之侍郎玉［保］”。⑤ 成为中央和地方各项军政的理政集合者后，玉保直接向密切关注准噶尔熬茶的乾隆帝奏报或接旨，改变了经军机处和理藩院等部院转达皇帝御旨或奏报事宜的通例。在谕旨和各路奏折中频繁出现的“静候玉保信息”“等候侍郎玉保之消息”“据侍郎玉保具奏”⑥ 等语，反映出玉保成为熬茶事务中定方制策的中心人物。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乾隆帝“寄谕侍郎玉保著详细奏复准噶尔人等有何疑虑”，是皇帝密切注视熬茶事宜，频繁与身在前沿的玉保联系之众多实例之一。“内大臣、户部尚书［傅恒］字寄照看准噶尔使臣等理藩院侍郎［玉保］……将此朱改，夹入玉保之夹板，交付兵部，日驰六百里送西宁，寻访玉保身在何处，即送何处。”⑦

如表 1-4 所示各次熬茶文件分类，在《熬茶档》四部分档案记载的比较中，提供从管理格局审视驻扎西宁的大臣玉保地位的升级和以西宁为中心的管理网络的形成。伴随玉保中心地位的确立，西宁办事大臣以及其他西宁军政要员的地位也冉冉上升，出现了西宁办事大臣直接上奏皇帝和朝廷直接寄谕西宁大臣的文件。从总件数看，西宁办事大臣的重要性逐渐趋同于驻藏大臣，且甘肃之凉州将军护卫准噶尔入藏职能完全被西宁军政取代。

表 1 《熬茶档一》熬茶文件分类统计表（第 1-263 页）

总件数	军机大臣件数	驻藏大臣件数	凉州将军件数
32	13	6	13

表 2 《熬茶档二》熬茶文件分类统计表（ 第 267-905 页）

总件数	军机大臣	大学士	侍郎玉保	驻藏大臣	凉州将军	甘肃巡抚
49	2	2	10	16	18	1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四月初五日《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第 273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第 305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第 305 页；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第 311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第 343-347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为知照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日期事咨行驻藏大臣傅清等文》，第 985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寄谕大学士庆复著暂驻陕西备办预防事宜》，第 1173 页；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学士庆复奏闻前往庄浪等候玉保消息折》，第 1205-1206 页；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法会期间暗加灌输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等发觉生疑》，第 1239 页。

⑦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寄谕侍郎玉保著详细奏复准噶尔人等有何疑虑》，第 1167 页。

表 3 《熬茶档三》熬茶文件分类统计表（第 915-1587 页）

<table>
<tr><td>总件数</td><td>军机大臣</td><td>侍郎玉保</td><td>驻藏大臣</td><td>西宁办事大臣</td><td>其他</td></tr>
<tr><td rowspan="3">93</td><td>25</td><td>15</td><td>18</td><td>1</td><td>西宁知府 1</td></tr>
<tr><td>军机大臣令玉保</td><td>谕著、寄谕玉保</td><td>寄谕驻藏大臣</td><td></td><td></td></tr>
<tr><td>1</td><td>3</td><td>4</td><td></td><td>25</td></tr>
</table>

表 4 《熬茶档四》熬茶文件分类统计表（第 1590-1896 页）

<table>
<tr><td>总件数</td><td>军机大臣</td><td>侍郎玉保</td><td>驻藏大臣</td><td>西宁办事大臣</td></tr>
<tr><td rowspan="3">26</td><td>3</td><td>12</td><td>2</td><td>5</td></tr>
<tr><td></td><td>寄谕侍郎玉保</td><td>寄谕驻藏大臣</td><td>寄谕西宁办事大臣</td></tr>
<tr><td></td><td>1</td><td>2</td><td>1</td></tr>
</table>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委以玉保代言天子的特殊使命。乾隆八年九月乾隆帝就准噶尔熬茶事降敕书于七世达赖喇嘛，侍郎玉保在准噶尔使臣到达前一日先行赴藏，亲授敕书。[1] 乾隆十二年六月又“命玉保至彼［藏］，晓谕颇罗鼐等，较前多资助准噶尔使臣等一二次”。[2] 这种举足轻重的重臣地位，伴随着军事权力的加强，不仅原凉州将军的护卫职责转移于玉保，安西提督李绳武，[3] 后任之川陕总督张广泗亦加入以西宁为中心的熬茶管理体系，[4] 并由西宁总兵张世维护守卡伦，暂设驿站。[5]

以玉保总领，西宁大臣、总兵、知府各职官直接辅佐的熬茶政务，由西宁辐射到安西、甘肃、四川、哈密各个地区，在藏区又与西藏政要通力合作，[6] 是青藏甘陕川军政一体协力管理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独有模式。作为清代边疆史中大规模接待劲敌入境，并长时间居内滞留的一种特殊情形，其管理内容变化莫测，无章可循，艰巨复杂，是青海史在边疆史中前无先例，后无复本的一笔史迹，如下若干非同寻常的管理措施值得专项梳理。

三、劲敌入境的无战役军事管理

熬茶路途卡伦严哨，军伍移调，使团陪护，蒙民迁徙，都是在接洽准噶尔、安顿入藏事宜的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性安全防范措施。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首件熬茶奏折就指出，“驻卡兵丁、蒙古游牧，不得令［准噶尔］使臣等睹见”。[7] 故卡伦驻兵和迁徙沿途蒙古游牧这类颇具规模的安置，成为难度很大的管理项目。待乾隆八年玉保全面接管后，拓展卡伦，安置蒙古，统领军务亦是他职责的重头部分。乾隆八年玉保奏折记录，“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三百名，筹情派员率带，于四月间起程，计使臣之抵达，前往哈济尔卡拉等候。西宁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卡伦人等，酌情往远拓展，直至哈济尔驻守。皂哈班哈柴达木等卡伦，仅有蒙古兵，故于使臣往返之前，再增派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一百名，交付［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增补驻守卡伦。青海蒙古等游牧，须照原议预先妥为迁移，于使臣等抵达前，将安设卡伦、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侍郎玉保奏报颁降七世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折》，第 565 页。

②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军机大臣讷亲奏闻令玉保晓谕颇罗鼐资助准噶尔人等须多于从前片》，第 1097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为知照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日期事咨行驻藏大臣傅清等文》，第 985 页。

④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大学士庆复奏闻前往庄浪等候玉保消息折》，第 1205-1206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侍郎玉保等奏请哈济尔等地展设卡伦并暂缓迁移蒙古游牧等情折》，第 1015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寄谕大学士庆复著即回京》，第 1243 页；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学士庆复奏报由庄浪起程返京日期》，第 1297 页。

⑦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防范事宜折》，第 24-25 页。

迁移蒙古游牧事宜，均行预先办理，相应俟侍郎玉保行抵西宁，会同副都统莽鹄赉，商议办理妥当”。[①] 玉保与凉州将军的协作关系是，侍郎玉保派头等侍卫三名率领绿营官兵一百名护送准噶尔使臣至东科尔。凉州将军乌赫图在距离准噶尔驻地一里外安营，“不为知觉暗中防范”。[②]

对于西宁在军旅重站的地位，军机大臣鄂尔泰对第二次熬茶前去西宁之中央护军有此描述：“去年护送准噶尔前往熬茶之使臣等赴藏时，拣选镶黄旗头等侍卫、侍卫什长达赖，正白旗头等侍卫巴木布里，正黄旗护军参领马进泰，镶黄旗护军副参领赖格引见，派往西宁。因齐默特等由东科尔返回，达赖等亦回抵京城。翌年护送前往熬茶之使臣等赴藏，仍派先前抽出侍卫达赖等四人护送可也。”[③] 对于地方护军，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臣于本年二月率带官兵自凉州起程，于是月十四日行抵庄浪，十六日率带庄浪之官兵，二十一日行抵西宁……至二十九日会同副都统巴灵阿率带官兵，于是年二月三十日行抵东科尔地方”。[④]

第三次熬茶时，西宁军务进一步得到加强。“准噶尔通往西藏共有五条道路”，每条皆设卡伦驻兵设防，“每卡派往兵丁百名”。这些道路紧要处“共备有一万五千名兵丁可供随时调遣。其余马步兵，均于各自之游牧地方预备”。[⑤] 乾隆十二年军机大臣进一步提出“免派满洲官兵，改派西宁绿营官兵”照看准噶尔使臣从东科尔入藏，并“交付西宁之总兵，择其优者，妥备办马畜、撒袋、鸟枪等物”。[⑥] 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侍郎玉保和青海副都统衔众佛保共同上奏皇帝“每年春秋派往巡查额色勒津、柴达木二路卡伦，其青海王公、扎萨克台吉内，每路有一人前往巡卡蹑踪，事毕返回，彼等均于九月初离家前往。又有庄浪满洲官四员、兵二十名，仅在秋季前来巡卡蹑踪一次，彼等于九月自西宁起程前往”。[⑦] 七月十四日玉保又“率官兵前往哈济尔卡伦迎接使臣等，携至哈坦和硕地方贸易，其余一百五十名官兵，及备带马驼、价钱，均皆留于哈坦和硕地方，逐水草牧放。等因。留下［西宁］总兵张世维”。[⑧]

迁移蒙古，防患边陲，是边防安全的一项不小的举动，和军事安排密切关联，西宁军政官员从上到下重任在身。商议准噶尔第一次熬茶准备程序时，“其先期迁移蒙古等游牧，探查行走路线之处，理应预为办理，相应咨文副都统巴灵阿、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由彼等会同遣派官弁，仔细勘查……伴送至东科尔地方……”[⑨] 之后的两次熬茶中，“预先迁移青海蒙古游牧等事宜，仍照乾隆八年所办之例办理”。[⑩] 具体操作是“兹经军机处奏准……将青海蒙古等游牧，俟水草返青，赶在准噶尔人等抵达之前，自四月二十日始陆续迁移，不仅于马畜有裨，蒙古之众亦不致劳累。相应委派驻西宁笔帖式索诺木，将青海蒙古等游牧，自四月二十日始陆续迁移”。[⑪] 又，由西宁总兵张世维遣派绿营兵一百名驻守卡伦，待准噶尔人等八月抵达哈济尔，于侍郎玉保确定来否东科尔后，迁移沿途所住蒙古之众。“遣派驻西宁笔帖式衮楚克、颛泰，不时严查消除蒙古之众与准噶尔等随意交谈、暗自贸易……”[⑫] 军机大臣讷亲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奏折详细记录了军防和蒙古迁徙在准噶尔熬茶青海进程中交织的程序：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四月初五日《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第 273-274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七月初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第 395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第 263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第 91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紧要处所设防兵丁数目折》，第 1195-1196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第 934 页。
⑦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侍郎玉保等奏请秋季免派官兵巡查额色勒津等卡折》，第 1109 页。
⑧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侍郎玉保奏闻前往古尔班乃济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第 1117 页。
⑨ 《熬茶档》上卷，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第 53-54 页。
⑩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侍郎玉保等奏请哈济尔等地展设卡伦并暂缓迁移青海蒙古游牧等情折》，第 1015 页。
⑪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四月初五日《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第 273-274 页。
⑫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五月三十日《侍郎玉保等奏请哈济尔等地展设卡伦并暂缓迁移青海蒙古游牧等情折》，第 1015 页。

青海蒙古等之游牧，需预先迁移。伴送使臣等，由经事新旧满洲、索伦、乌拉齐、蒙古侍卫章京内，选派四员。伴送至藏之兵丁，选派庄浪、凉州满洲官兵五百名在东科尔地方等候；抽调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酌情派员，计使臣等抵达之期，前往哈济尔卡伦等候。所有设卡驻防、迁移蒙古游牧等务，令钦差侍郎玉保及所派员弁事先起程前往西宁……俟使臣等抵达卡伦赏赐一次，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起程赴藏时赏赐一次外，俟事毕返回时，在青海附近再赏赐一次……派往照看大臣、章京、笔帖式、领催等，由京城起程前往西宁时，准领乘驿前往外，由西宁赴藏时，照赴藏使臣、大臣、章京之例办理遣往……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进藏，仍行经噶斯路，相应将增派兵丁拓展卡伦，预先迁移青海蒙古等之游牧等事务交付［办理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衔众佛保……[①]

在如此高度军事化的熬茶管理中，无生死之相搏，无箭戟之酣战，但自朝廷到西宁及其周边地区，准备准噶尔入藏的顶级军事戒备状态，不亚于打一场无硝烟之战。

四、应急筹划、化解困局的管理程序

大量记载显示，准噶尔熬茶成行之前与清廷商定的大致计划，常会在准噶尔使团进入清朝境内后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种种事先未知的要求提出于准噶尔进入青海之后。故玉保在实施接洽、伴送和照看准噶尔熬茶全程的资助赏赐、贸易安置、寺庙礼佛、法会布施、人员生活、健康避痘、牲畜调换、牧场饲养等等多项预定事务时，[②]不时定夺新问题是熬茶进程中的一项棘手“常务”。乾隆帝赐予他随机筹划、灵活变通、全权办理之大权，使玉保多次化解困局，在第一次熬茶准噶尔未果而归后，他所负责的第二、三次熬茶事务均得以圆满结束。

关系熬茶成败的贸易量及价格问题贯穿三次熬茶进程。第一次熬茶，准备在“使臣等于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伴送至藏”的凉州将军乌赫图便遇到如此难题：

［准噶尔使臣］前来告称……我使臣等前往大皇帝处祈请赴藏熬茶之时奉旨将我等之货物携至西宁、东科尔等地出售后，采买在藏熬茶所用物件，携带至藏…… 今自抵此，凡牧放我等之马畜，及我等所食牛羊口粮，均称系大皇帝之旨，惟议及货价，皆称系民人购买我等之物。如今出价如此之低，我等之货物不便出售。……俟将尔等贸易之事如何裁定之处咨复前来，我等再定起程日期。等语。嗣据甘肃巡抚臣元展成咨文内称，查得，准噶尔等人原为赴藏熬茶而来，并非专特前来贸易，如今彼等抬高物价，欲遂其贪欲，然商民不可扰累……经军机处再三会议，务令价格公允，酌情办理，不得肇启其贪心，伤害商民……臣等查得，准噶尔人等本不可信……彼等虽称贸易事小，熬茶事大，然其内心仍以贸易之事为至要……将此或仍交付总督、巡抚等酌情办理准噶尔等之贸易事宜再行赴藏。[③]

进一步的谈判中，乌赫图“照军机大臣等之咨文，明白晓谕准噶尔人等，准噶尔人等随后出售狼皮三千六百余张，羊皮三万零五百张，其余物件并不出售。前曾高称拟于本年七月底起程赴藏，继于七月二十日，准噶尔……前来告称……我等蒙古往来行走，但靠驼马，而今我等之骆驼已不堪用，且马亦水土不服……我等谨此告知大臣等，俟至办妥我等之贸易之事，请准返回……”[④]最终，军机大臣传达乾隆帝旨意，“倘若彼等收回其言，照原意办理，如若执意返回，则听其便”。[⑤]后驻藏大臣纪山总结第一次熬茶管理之难：“并无准噶尔三百人自西宁起程之确切

①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第 933 页。
② 史料基于《熬茶档》下卷，第 1647-1648 页；第 1653 页；第 1689-1694 页；第 1713-1715 页；第 1723-1724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起程赴藏折》，第 147-149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第 195-160 页。
⑤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第 165 页。

消息，至藏之后又将如何挨延持久之处，均难预先确定。”加之“西藏此次供给熬茶准噶尔等、内地护送官兵、臣等住藏官兵之处甚多”，每月需用钱粮银巨额。[①] 军机大臣讷亲亦曰：“兹准噶尔使臣等仍住东科尔地方贸易，暂无起程前往之消息，藏地换防五百名兵丁，倘若仍令留驻，无所用处，枉费钱粮”。[②]

第二次熬茶期间清廷对准噶尔路程上的活动安排给予了很大机动性，考虑他们的各类要求，尽量满足。这种状况增加了清方对准噶尔行进计划的不可预测性，管理的艰巨性随之升级。在东科尔贸易地点的安排、日期的勘定，都是不确定的。乾隆八年六月十九日玉保奏折记：

> 据前往更换驻噶斯迎接使臣侍卫达赖之副护军统领赖格前来报称，五月二十日，于噶斯之古尔班皂哈地方，遥见准噶尔使臣前来。计为首使臣吹纳木喀、喇嘛第巴纳尔巴、商卓特巴，副使巴雅斯瑚朗、多尔济，噶尔丹策零近侍四人及随从等在内共三百零三人，二千三百五十三匹马、一千三百七十三峰驼、一千八百三十九只羊、一百七十三支鸟枪、七十副撒带。……据纳木喀告称……惟念经所需银两、哈达等物，现均不齐备，拟先往东科尔贸易，换取银两、哈达等物，再行进藏为好。……[③]

对准噶尔提出的一半人前往东科尔贸易，一半人由卡伦赴藏熬茶的提议，乾隆帝谕玉保：“尔之所虑甚是，而况又控事如前年，凡事尔但相机好生处理”。[④] 最后权衡的解决办法是拒绝其西宁贸易之请，但在东科尔贸易中狐皮价格上满足准噶尔的要求，不过“嗣后遇有贸易之年，不得以此为例，仍按时价贸易”。[⑤]

熬茶事务在青海事项的繁重，使刚到达西宁不久的玉保建议皇上增加西宁的官职人员，并应想办法提高各地军政参与管理的行政效率。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玉保奏曰：此前“西宁地方有总兵一员，导员一员，知府一员……办理使臣等之所有事项，未敢即行专断，故先禀报总督、巡抚、布政使，俟有指示，方行遵办。由西宁送达甘肃巡抚，两千余里……以臣愚见，将甘肃巡抚或布政使，派一员至西宁，就近办理使臣等之事，则熬茶之事似可尽速告竣”。[⑥] 对此，乾隆帝派遣的并不是甘肃巡抚手下一员，而是巡抚本人。“谕著甘肃巡抚黄廷桂速赴西宁照管准噶尔使臣贸易事宜”，“俟至接旨，即往西宁，将使臣等交易之事，速行料理，俾得即速起程”。并由兵部侍郎“限日驰六百里，咨行侍郎玉保、巡抚黄廷桂”，以运筹“来者中派一半人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俟至哈坦和硕地方后，再起……逢严寒不便返回，暂住西藏，俟至来年水草返青，再行起程。……过冬期间，定需继赏口粮……倘若不敷，由四川办理粮饷官员支取应用”。所有这些措施意在避免“前次来使因贸易之事滞留，以致逾期不能前进，半道空回”之再现。[⑦] 这些政务的需求和朝廷的安排，大大加强了玉保在西宁的管理班底和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应对能力。

第三次熬茶中棘手的价格问题，曾使清准双方一度僵持到难解的境地。玉保对准噶尔人曰：“尔等之玛木特为使赴京时，曾言仍旧携带价值八万两货物，并未言及携带价值三十万两货物，故而本大臣并未传至价值三十万两之商贾。”有关贸易价格的争议，准噶尔人言：“我等商议之时，大臣曾言按东科尔交易之例给价，现予否认，乃赖我也”。玉保回应：“我未曾与尔定议价钱，尔所记也。……观尔等如今前来，不提尽速办成尔等之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之事，反以贸易为重，尔等此次又如何成就尔等台吉之事”。再，“商贾原本出于自愿贸易，岂有勉强小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八月十七日《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第 181-182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撤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片》，第 187 页。

③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十九日《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第 359-361 页；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第 344 页。

⑤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赴东科尔贸易完竣折》，第 431-432 页。

⑥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侍郎玉保奏请遣派要员至西宁办理准噶尔使臣事宜折》，第 367 页。

⑦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备办准噶尔使臣在藏过冬事宜折》，第 387 页。

民给高价，以利尔等熬茶之事之理”。[①] 在得卜特尔卡伦，准噶尔人再度埋怨：“大臣秉承大皇帝旨意，承办我等熬茶事宜，我等之商贾与此地商贾议价近半月，仅议定沙狐、貂皮、狼皮、水獭等六七项皮张之等级，其价钱至今未定，而狐狸皮之等级至今迟迟不定。……请大臣准将我等之价钱仍照先前东科尔贸易之例办理”。玉保针锋相对：“兹尔等意欲获取高价……实无完结之日。……尔等之交易虽大致已定，然七千余张狼皮之优劣，尚与我等之商贾彼此争论，仅点取其半，如此则何时方可完竣赴藏”。在以满足准噶尔人赏赐马驼要求为条件后，“继而议定价钱，至是月十二日，共点取灰鼠皮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张、狼皮五千六百九十六张、羊羔皮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张，约于本月二十日后贸易事竣”。[②] 如此艰难的协商，揭示了准噶尔贸易规模之庞大和熬茶管理之不易。以玉保为中心而实施的适实的筹划、变通的策略，多次化解了难题与冲突，推进了准噶尔熬茶的步步进程。

五、藏前礼佛、青海布施的熬茶经略

青海不仅是准噶尔西藏熬茶之贸易基地，亦是熬茶礼佛前站。每次熬茶，准噶尔使臣都提出在青海的寺庙礼佛布施，青海的礼佛实是入藏熬茶的先期组成部分，成为玉保管理政务中另一重项。

准噶尔提出在青海礼佛的要求，对护卫第一次熬茶的凉州将军乌赫图而言甚是出乎预料，但最终予以准行。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对此情形记录在案：

> ［准噶尔众使臣］告知臣等称，西宁之塔尔寺，系宗喀巴佛诞生地；又黄河以南扎西车里寺，系阿寿、阿旺喇嘛居住地。我等前来时，噶尔丹策零均皆献布彦，嘱令我等前往熬茶。我等告知大臣等，请准往此二寺熬茶。等因前来。臣等告知彼等称，昔尔等之人往请圣恩之时，仅称赴藏熬茶，并未具奏前往他处熬茶，兹复称前往此二处者不宜行。等语。据多尔济等告称，先前虽仅奏称赴藏熬茶，然念此二寺均在内地，顺便去往即可，故未另行具奏。宗喀巴佛乃我众喇嘛之佛祖，扎西车里寺所居喇嘛，亦为名僧，我等先行去往此二寺熬茶，而后再赴藏熬茶，方可彰显恭敬。倘若不能前往，我等难以返回。等因再三告请。……塔尔寺位于西宁以南五十里处，距东科一日路程，并无蒙古游牧，往返需时二三日，故臣等允其前往塔尔寺熬茶之请。现准噶尔人等择日派其二名喇嘛头目等，率带五六十人前往塔尔寺，相应俟准噶尔等前往时，臣巴灵阿率满洲官兵一百名，带同准噶尔人等前往。…… 惟扎西车里寺位于黄河以南，路途遥远且沿途皆系蒙古游牧地方，故而臣等未准其请。[③]

待第二次熬茶，清朝方面对准噶尔在青海礼佛有了常规感。乾隆八年六月初七玉保奏报，“依照军机处奏准之例……［准噶尔］使臣等抵达东科尔贸易期间，将前往衮布木庙、大藏寺、塔尔寺熬茶念经。”[④] 具体施行记录在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折中。“［七月］初三日自东科尔启程，照料准噶尔人等行抵大藏寺。……七月十三日自东科尔启程，前往衮布木庙熬茶。…… 于七月二十一日照料彼等起程前往塔尔寺熬茶，是日抵塔尔寺。”[⑤] 同年八月，准噶尔使臣提出“明日路

---

①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卡伦商议贸易事宜折》，第 1223-1225 页。

②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贸易事宜即将告竣折》，第 1255-1256 页。

③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第 117-118 页、131 页。扎西车里寺为拉卜楞寺旧称。另见乾隆六年六月初五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第 125-132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第 346-347 页。

⑤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第 473-474 页。

经东科尔寺，我等仰赖大皇帝之恩，已于衮布木庙等三寺熬茶，顺此路便，亦欲于东科尔寺熬茶念经。”因“准噶尔等前年亦于此东科尔寺熬茶念经，”其请得允，连夜疏散东科尔寺内蒙古喇嘛以回避。[①] 本次青海熬茶，塔尔寺礼佛者最多，“前往喇嘛十四人、蒙古九十一人，回子七人，共一百一十二人。”大藏寺“前往喇嘛十三人、蒙古五十五人。”前往衮布木庙和东科寺的人员数未记。[②]

第三次赴藏熬茶时，在青海之礼佛又扩大到包括西宁大臣管辖下的衮布木庙、大藏寺、郭隆、达希澈累四寺。“达希澈累寺靠近西宁界内河州，衮布木、大藏、郭隆等寺靠近东科尔。”[③] 安排这些历次临时要求并不断增添的青海礼佛，准备工作颇不轻松。乾隆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折》记：

> ［准噶尔］斋桑巴雅瑚朗等来至臣［玉保］之住处，告称，我等现派六人前往衮布木、大藏、达希澈累、郭隆等寺熬茶，请大臣拨给我等遣往人等乌拉乘驿，派人伴送，俟熬茶毕，由彼追随我等至藏。臣［玉保］称，此次尔等之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奏请我大皇帝恩之奏书内，仅称派人赴藏熬茶，并未言及派人前往西宁所属衮布木、大藏、达希澈累、郭隆等寺熬茶，且尔等之使臣玛木特口奏之时亦未提及。［经反复商讨，玉保］咨文驻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衔大臣众佛保称，准噶尔有六人前往衮布木等寺熬茶……相应令沿途附近居住人等稍加回避……俟确定前往衮布木等寺熬茶之日期，交付理藩院笔帖式颛泰等伴送。……甘肃巡抚黄廷桂、西宁之署理总兵臣严斯涵等处，均已咨文前去。[④]

此次熬茶礼佛“人虽少，却大有关系”，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衔大臣众佛保方面做出了严格的防御措施，对每时每地的人员接触、庙宇接待、防守护卫、住宿下榻、佛事活动、书信礼品等等事项都高度戒备，以防闪失。[⑤]

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的奏折揭示了准噶尔在西宁熬茶活动的规模：“十一月十二日，笔帖式衮楚克、颛泰带准噶尔人等前往大藏寺熬茶四次……是月十六日，前往郭隆寺熬茶四次……是月二十一日，前往衮布木寺熬茶四次……是月三十日，前往达希澈累寺熬茶三次……”[⑥] 故在十一月十二日至三十日之间，准噶尔在青海的熬茶活动多达十五次。从接待准备到具体安排，西宁军政班底事无巨细地承担职责。

进藏礼佛实际成为青海礼佛的延伸，或说青海礼佛是进藏礼佛的序幕。在此序幕中，无论其宗教意义还是地理可达性都使西宁成为最佳之地，也是熬茶管理事务最为繁重的地区。

六、接济赏赐、多方关照的行程管理

接济赏赐是熬茶管理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施调拨安排。在历次接待准噶尔的计划中，虽事先精心部署，因临时需求而增加济赏的事项仍频频入政。从哈密到达西宁、东科尔时，准噶尔已是人员劳累，马驼疲惫，牧群消瘦，口粮殆尽。清廷赏予面茶，接济牛羊，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第 491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第 473-474 页；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第 491 页。

③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折》，第 1272 页。又见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前来熬茶之六人抵达东科尔日期折》，第 1305 页。

④ 《熬茶档》下卷，第 1271-1273 页；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起程前往衮布木寺熬茶日期折》，第 1291-1292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人等前来熬茶之六人抵达东科尔日期折》，第 1305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青海各寺熬茶情形折》，第 1613-1614 页。

补给马畜，助放牧群，青海各地军政尽责尽力。[①]

不仅准噶尔使团需要补给，清方护送官兵的需求也要保证。对第一次熬茶的准备工程，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折》记："东科尔至藏之路程，虽不过三个月即可抵达，然途中遇有水草丰美之地歇息马畜，渡河步水，耽搁延宕，在所难免，相应臣等酌情拟定，运送至四个月口米，八个月盐菜银，以资沿途食用。……臣纪山约计官兵至藏拘留二个月，返回时拨给口米八撮三抄计，六个月共需口米一千四百九十四石。"[②] 又有《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记：护送官兵，拨给之马畜如准噶尔使团行至东科尔、藏地之间遇到恶劣天气、行程受阻时"无所后援，不仅有碍准噶尔人等观瞻，于大国军容，亦大有关碍"。[③]

待准噶尔人进入青海，西宁、东科尔是赏赐补给最重要之场所。乾隆六年准噶尔人等第一次到达东科尔时，马驼"均已羸瘦疲惫，西宁总兵周祈丰派绿旗官兵，收取其骑之马驼，于伯罗冲口、奎托恩库屯等处寻觅水草之地牧放"。另，"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时，拟每五人赏给牛一头，每人赏给羊二只，其米面等项，则计其足敷赏赐……交付镇海参营参将王达璋、西宁知府沈梦溪等，晓谕圣上抚远之至恩于准噶尔人等，将牛羊、米面、炒面等物，照原议之例，如数赏赐。准噶尔三百零三人均皆欢喜，叩谢圣恩收受"。[④]

第二次熬茶期间，玉保于乾隆八年四月初二自西宁起程，二十六日到达得卜特尔卡伦，在那里准噶尔使团告知："由噶斯至此，倒毙驼二百余峰、马三百匹，现仍在倒毙，乃大臣知之者也。倘非大皇帝施恩，我等非但不能进藏，即便游牧亦难返回"。[⑤]在起程进藏之前，准噶尔使臣请求：

> 我等现拟于九月初三日起程进藏。我等来时，路途回远，驼马疲乏，且又择其优遣往东科尔贸易，此处所剩马驼，皆为疲乏者，倒闭驼三百余峰、马四百余匹。遣往东科尔贸易时，在途倒毙，存留者极少，马驼百余匹，行抵东科尔牧放时，倒毙驼四十余峰、马二十七八匹，自东科尔起程前来时，起程第三天，行抵纳兰萨兰地方，因七十余峰驼不能行走，遂弃之而来。现自东科尔而来马驼内，堪以进藏者极少……我等前来五群人众内，有带一二百马驼而来者，亦有带一二十马驼而来者，多带马驼者尚可，少带者之马驼，有尽数倒毙者，剩一二者亦有之。其无马驼者，又将用何骑驮？…… 我等入藏时，每人若无二三匹马，实难成行。经挑选，我等之马匹，不够每人二三匹，尚缺三百三十一匹马。[⑥]

玉保上奏此请，乾隆帝"谕令使臣等之马驼倘致疲乏，口粮若断，施恩赏补马驼并接济口粮"，由凉州将军乌赫图实施，"圣上专特恩准资助，赏给马三百匹、驼三百峰用于更换"。[⑦]

与此同时，西宁总兵张世维在准噶尔于东科尔贸易，于周边寺庙礼佛期间，遣派官兵收管准噶尔骑来之马九百九十九匹，骆驼六十三峰，代为牧放附近水草丰美之地。"侍郎玉保奏折内称，准噶尔等将前往衮布木庙、塔尔寺、大藏寺熬茶，并将其贸易务于一个月内完竣，令其来至卡伦地方，［将张世维所放马驼］作为礼品布施一同带往西藏。"[⑧]

对于"［准噶尔］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之四十六人、驼六百一十五峰、马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第 247 页。

② 《熬茶档》上卷，第 37 页。

③ 《熬茶档》上卷，第 63 页。

④ 《熬茶档》上卷，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第 99 页。王达璋为"办理准噶尔贸易事务镇海营参将"，见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折》，第 103 页。

⑤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七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骒马情形折》，第 414 页。

⑥⑦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第 513-514 页。

⑧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七月初九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第 395 页。

八百二十二匹,”俟定赴藏使团由藏返回日期，由清朝方面“派人陪同尔等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点收人畜之人，点交所留人畜，送出卡伦由噶斯路遣往。尔等四十六人须严加管教不得妄自狩猎为好。否则，肆意狩猎，或致迷路，或遇不知者被劫，则有碍和睦之道”。再，“相应将如何拨补此等候四十六人之处，咨文川陕总督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查照办理外，亦咨文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去讫。”。[①]

到达西藏之后，准噶尔又有倒毙马驼，其余生存牲畜由清方托藏人放牧照管，对准噶尔使臣来说“我等之马畜得以膘壮，有利于我等返回游牧”。[②] 在准噶尔熬茶完毕从西藏返回时，清廷还安排另一轮马驼、食粮、用品接济他们并给他们再次进行贸易的机会。例如，第二次熬茶时，对一百二十余人的准噶尔使团路费银两、牛羊茶油面等方面的需求，由玉保携带的三万银两支付，并由玉保帮助安排调拨绿营兵强壮马匹，“收取疲惫马畜抵补”，还进一步协商何时何地如何换补等诸细节，使准噶尔使团得以回程。此外另有筵宴准噶尔使臣，互赠礼物之仪式。[③]

乾隆八年八月初七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骡马情形折》记，在此次熬茶途中，一准噶尔使臣在行往东科尔的路上患病，使臣吹纳木喀来至玉保住处告称：“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自来此地，因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疼痛不止，在游牧时，旧病复发，胃满积食，饮过骡马奶方见好。兹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暂向大臣要取带驹骡马数匹，做成酸奶饮用，……于我喇嘛病痛实有益处”。对此，玉保就近一面向青海扎萨克头等台吉哈尔噶斯等旗取要骡马十二匹，分给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各人六匹，一面“咨文办理青海蒙古事务副都统宗室莽鹄赉去讫”。[④] 是为玉保在青海熬茶管理中内容无所不包其中一例。

第三次熬茶除继续执行赏赐和接济政策外，也根据情况解决新出现的要求。一次，准噶尔使臣向玉保要求以清官兵强壮马匹调换准噶尔羸瘦疲惫马匹，并拨给取代倒毙之马畜驼只，以能够抵达西藏。玉保统计倒毙和生存数目，一方面戒以“尔等不可企图侥幸多得”，一方面安排实际所需之替补牲畜，并安排人员牧放饲养准噶尔疲惫马驼，以方便在回程时可以骑用。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在喀喇乌苏“臣将照看使臣等进藏三百名官兵之马匹内，选出二百八十四匹乘骑外，酌情雇给骑用马二百九十八匹、驮用牛二百零九头，将牧放官兵之疲惫、掌破之马五百九十一匹，看守官兵赘物之五十名兵丁留于喀喇乌苏。……所付银两，系由臣之备带两万两银内动支使用，相应俟臣返回，另行奏销”。[⑤]

接济赏赐，事务繁絮，看似琐碎但干系重大，决定着熬茶进程的每个环节能否顺利推进。在强调熬茶意义和清、准、藏各方关系大方面观察视角的同时，这些保证熬茶活动顺利进行的既关键、又容易被忽视的日常细节，不应该继续被忽略。

七、职及藏地、左膀右臂的青海班底

继第二次熬茶玉保参与在藏熬茶管理之后，第三次熬茶更形成玉保在藏礼佛管理中进一步的领导地位。诸多事例中，如下史实颇具代表性。

第三次进藏的准噶尔熬茶人达三百，且时日颇长。朝廷的紧张基于准噶尔“于九月十四日抵达哈济尔，俟至得卜特尔地方贸易事竣起程，约于十一月二十日之后抵藏，熬茶之事，至翌

---

①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第 515-516 页。

② 《熬茶档》上卷，乾隆八年正月十六日《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第 591-594 页。

③ 史料基于《熬茶档》上卷，第 803 页；第 843 页；第 819 页；第 871-872 页；第 893-895 页；第 811 页。

④ 《熬茶档》上卷，第 413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侍郎玉保等奏报行抵喀喇乌苏拨给准噶尔使臣及照看官兵马畜数目折》，第 1637-1638 页。

年正月十五、二十日后方可完竣。按藏地习俗，自正月初五日始，至二十九日止，修好事念经，各地人众瞻拜贸易，故极为熙攘，准噶尔人等乘间探听信息，挑唆离间，亦难预料”。[①] 但经过有效管理，熬茶进程稳步推进。熬茶腹地西藏的很多事宜仍是依靠玉保及西宁管理团队协助落实。例如，乾隆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密谕傅清等预备回复准噶尔人等做擦擦之请片》记：

> 上次准噶尔使臣等赴藏之前，索拜奏请倘若噶尔丹策零告请以其父尸骨做擦擦应如何应对，乃为预先备办者。而后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无提及将策望阿喇布坦尸骨做成擦擦，密饬达赖喇嘛告知彼等缘由并未记录在案。……抑或玉保奉有训谕。此次使臣等倘若告请将策望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之尸骨做成擦擦，即照圣上训谕，详谕达赖喇嘛转告之处，密行傅清、索拜遵照办理，并咨文知照玉保。并拟咨询玉保是否记得前次所将谕旨，倘若不记，即命照现降谕旨办理。[②]

在同日发出的《寄谕驻藏办事大臣傅清等不得应允准噶尔人等做擦擦之请》档案中，“将此交付于兵部郎中福成，缮写寄信傅清、索拜之旨，装入傅清之奏匣寄往外，缮写寄信玉保之旨，装入封套钤印，交付兵部随带封套，马驰递送西宁，交付副都统衔众佛保转送玉保”。[③] 至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机处直接寄信玉保，指示将皇上旨意“密谕达赖喇嘛、颇罗鼐……［对准噶尔］加以制止”。[④] 两天之后，军机处再议玉保之奏，“仍照原降谕旨而行”，由兵部同时发函驻藏大臣和玉保，马驰递往。[⑤] 玉保在哈济尔卡伦见到准噶尔使臣阿喇布扎时，回答诸多问题，奏报朝廷，以定对策。[⑥]

第三次熬茶活动结束后，玉保上奏准噶尔进献各寺庙物件清单供军机处查核。“进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寺庙之金四百余两、银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散给各寺庙喇嘛等布施银九万六千八百余两，其中给银各二十五两之堪布喇嘛十五名，给银各五两之喇嘛一万六千六百名，给银各一两之喇嘛一万零二百余名，给银各一钱之喇嘛二万零六百余名，得布施银之喇嘛共四万七千七百余名。”[⑦] 又，“此次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熬茶进献、散给布施共金四百一十九两三钱，银十五万六千七百五十六两一钱。经比较，金较前次少十六两七钱，银较前次多五百八十九两一钱”。[⑧] 清单上的金银和人头数额，从财务的角度呈现出准噶尔的熬茶规模和清朝的熬茶管理程度。

《熬茶档》中第三次熬茶的档案条文，不仅展示了侍郎玉保对藏中事务的深入参与，也凸显了西宁军政班底在边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玉保在藏事务，从日期安排、路线行进、银两调拨、清单缮写、口粮颁赏、牲畜照看、马驼牧养、翻译交流以及贸易行事等等，[⑨] 都有西宁办事大臣和西宁总兵官左膀右臂般的支持。例如，乾隆十二年，侍郎玉保、总兵张世维等率准噶尔使臣等前往西藏，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把关沿途卡伦事务，调度护卫绿营兵，管理留守准噶尔人畜

---

①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法会期间暗加灌输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等发觉生疑》，第 1239 页。

② 《熬茶档》下卷，第 1075 页。

③ 《熬茶档》下卷，第 1081 页。

④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侍郎玉保奏请借故婉拒准噶尔使臣做擦擦之请折》，第 1129-1130 页。

⑤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准准噶尔使臣请求做擦擦仍照前降谕回复折》，第 1145-1147 页。

⑥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九月初八日《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派人至哈济尔卡伦告称受阻于塔里木河折》，第 1159-1160 页；《寄谕侍郎玉保著详细奏复准噶尔人等有何疑虑》，第 1167 页。

⑦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三年九四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傅恒奏报查核准噶尔人等散给布施银数目片》，第 1863 页。

⑧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三年九四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傅恒奏报查核准噶尔人等乾隆九年散给布施银数目片》，第 1867 页。

⑨ 史料基于《熬茶档》下卷，第 1317-1318 页；第 1323 页；第 1785 页；第 1811-1815 页；第 1821 页；第 1853-1859 页。

放牧事务，保证驿站通畅。[①] 西宁办事大臣还担负着具体奏报准噶尔在青海各寺庙熬茶活动的所有情况，包括礼佛次数、布施物件，准噶尔使臣于寺庙喇嘛书信往来、遗物转交、马匹调换、赏赐羊茶面盐及酥油数额和护卫兵丁与准噶尔住宿灯用，如此等等。[②] 另有总兵张世维和唐喀禄等负责照看“自羊八井、达木路前来喀喇乌苏之［准噶尔］使臣”的熬茶活动。[③]

八、结论

理藩院侍郎玉保所主持的熬茶管理，属于清代边疆史中以西宁为中心、青海为要地的历史内容。即使玉保前赴甘肃，有陕甘军政之辅佐，又亲往西藏，与驻藏大臣协力合作，但准噶尔熬茶的整体过程若无西宁之中枢，则无藏区之礼佛。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详细排列了准噶尔熬茶的行程安排、寺庙朝拜、集市贸易、马驼照料、军事部署、财物供给、官员职责、部院协作、上下交流，如此等等，一目了然，为我们提供了聚焦青海，详观西宁，审视准噶尔熬茶的综合视角。

有关熬茶路线的准备：“准噶尔赴藏人等，既由噶斯路行走，请准增派兵丁至卡伦，展设至哈济尔。青海蒙古等之游牧，须先迁移。…… 预先迁移青海蒙古等之游牧等事务，交付［西宁］副都统衔众佛保……”

有关军务：“抽调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酌情派员，计使臣等抵达之期，前往哈济尔卡伦等候。所有设卡驻防、迁移蒙古游牧等务，令钦差侍郎玉保及所派员弁事先启程前往西宁……接应使臣等……”并西宁将军、西宁总兵均有派兵之责。

有关贸易：侍郎玉保及所派员弁等“率带其余绿营兵照看使臣等至东科尔地方贸易，贸易已毕，会同将军乌赫图率带官兵伴送至藏”。

有关“赏补使臣等之牲畜口粮”：“抵达卡伦赏赐一次，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启程赴藏时赏赐一次外，俟事毕返回时，在青海附近再赏赐一次。使臣等之马畜倘有疲惫者，所派大臣等由原先饬令地方官员备办马驼内支取，酌情赏补。”

有关“接济官兵所用牲畜口粮”：“由所派大臣等所备马驼内调拨给予调换。……动拨银三万两带往。伴送使臣等之官兵，由东科尔赴藏时，备办四个月口米，八个月盐菜银；驻藏期间，备办二个月口米；返回时，备办四个月口米。……交付侍郎玉保亦均照八年所办之例办理……”

有关官员安排：“派往照看大臣、章京、领催等，由京城启程前往西宁时，准令乘驿前往外，由西宁赴藏时，照赴藏使臣、大臣、章京之例办理遣往。”

有关中央与地方的衔接：“除奏准遣派理藩院章京外，其笔帖式、领催……由侍郎玉保率领于四月启程前往西宁，所有应办事项，会同副都统衔众佛保商议，办理妥当。”

有关地方合作：“倘若欲令熬茶人等前往西宁、东科尔采买物品贸易，侍郎玉保等当一面奏闻，一面咨文［甘肃巡抚］黄廷桂。……由西宁前往噶斯、藏地时，……咨文驻藏办事副都统傅清……与颇罗鼐共同商议……”

有关中央部院协作：“将此缮文……马上驰递副都统傅清外，其交付兵部、户部、理藩院，从速咨行应行咨文之处，办理应办事项之处，亦交付于中书五十。“至遣派侍卫、章京之处……

①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已饬留守官兵好生看管准噶尔人畜折》，第 1329 页；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请暂免撤回曾驻卡伦绿营兵折》，第 1739 页。

② 史料基于《熬茶档》下卷，第 1613-1615 页；第 1625-1626 页；第 1745 页；第 1767-1770 页。

③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日《侍郎玉等保奏报拨给准噶尔人等马畜自喀喇乌苏起程折》，第 1877 页。

亦另缮片交付于内务府。”①

有关化急解难，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侍郎玉保奏报动拨带往西藏银两垫付货款折》记，“据办理贸易事务西宁知府刘宏绪呈称，卑职等已尽数收购准噶尔人等携至货物……尚缺银四千三百五十两，再由西宁运至，则赶不及准噶尔人等起程赴藏，相应请由备往西藏之两万两银内，借取四千三百五十两，支给准噶尔人等。俟卑职等返回西宁，再拨还原项。……此项银两足敷则已，倘若不敷，即拟由西藏所存钱粮内动支使用。咨文甘肃巡抚大臣黄廷桂、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外，其准噶尔使臣等交易物件数目、银两数目，另缮汉字清单，一并谨具奏闻。”②

有关玉保的核心地位，在乾隆帝亲自关照下，军机处、理藩院、兵部、户部、凉州将军、驻藏大臣等等和熬茶有关之军政职官，都“会同侍郎玉保详议办理”。③

从清代边疆治理之大角度而论，雍正二年（1724）“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为“西宁办事大臣”或“青海办事大臣”）之职位设立，是青海在边疆事务中地位上升和西宁在边疆管理中战略性地位增强的体现。乾隆朝准噶尔熬茶事件恰好证实了雍正朝在此地边疆管理设置上的先见之明，也更进一步提高了青海和西宁在清代边疆全局事务中的重要性，且在朝廷与地方的行政关系中，皇帝与西宁达到空前的紧密。如果说乾隆朝时的准噶尔熬茶促成了清代藩部体系的最终形成，④则西宁管理中心和青海接待要地在此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清代历史上这一独具特色的历程，是我们考察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体如何运作，从一民族到另一民族生活和文化如何交织的一块新屏幕。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对准噶尔熬茶事件在青海史实的详尽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乾隆前期青海历史的认识，突出地展示了青海在清代边疆事务中既与周边各地关联至密，又表现出在地域和行政建制上自成体系的特征。正如笔者已经发表过的研究结论：不特别书写连接蒙、藏、新疆、内地四方之青海历史，就难以描绘全方位的整体清代边疆。⑤建立青海学，是全方位研究清代边疆史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References

Chia Ning. “Placing a ‘Qinghai Study’ in the Field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Southeastern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30 (2008). Translated by Dong Jianzhong as “‘Qinghaixue’ chuyi”. *Qinghai minzu yanjiu*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1)2012.

Chia Ning. “Xining banshi dachen yu yongzheng shiqi Qinghai duominzu quyu guanli zhidu zhi xing cheng” (The Grand Minister Resident of Xining and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in the Highly Diverse Qinghai). *Qinghs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3)2012.

Lü Wenli. “Qianlong banian menggu zhunga’er bu jinzong aocha shimo” (The Process of the Zhungar Pilgrimage Journey to Tibet in the Qianlong Eight Year). *Mingqing luncong*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2)2012.

Lü Wenli. “Qianlong qianqi (1736-1750) de qingzhun maoyi – yi jiaoge, maoyi fangshi de boyi jiqi yingxiang wei zhongx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Qing and the Zhungar during the Early Qianlong years [1736-1750] — Centered at Competitive Battling Through Price and Trade). *Xibu menggu luntan* (Western Mongolian Forum)(3)2014.

Lü Wenli. “Qianlong shi’ernian zhunga’er ruzang aocha shimo” (The Process of the Zhungar Pilgrimage Journey to Tibet in the Qianlong Twelfth Year). *Sibu menggu luntan* (Journal of the Western Mongolian Studies)(2)2013.

Lü Wenli. “You Qianlong chunian zhunga’er sanci ruzang aocha kan qingchao fanbu tixi de xiangcheng guocheng”

① 《熬茶档》下卷，第 933-935 页。

②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侍郎玉保奏报动拨带往西藏银两垫付货款折》，第 1323 页。

③ 《熬茶档》下卷，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敕令珠密那木扎勒防范准噶尔人等折》，第 1337 页。

④ 吕文利：《由乾隆初年准噶尔三次入藏熬茶看清朝藩部体系的形成过程》。

⑤ 贾宁：《西宁办事大臣与雍乾时期青海多民族区域管理制度之形成》；贾宁：《“青海学”刍议》。

(The Three Zhungar Pilgrimage Journeys to Tibe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anlong Reig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waifan* System [the non-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Frontier Regions]).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2)2015.

Lü Wenli and Zhang Rui. "Qianlong nianjian menggu zhunga'er bu diyici jinzang aocha kao" (The Study of First Pilgrimage Journey to Tibet of the Zhungar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Niemenggu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4)2010.

M. Wulan. "Zhunga'er dui 1717 nian shijian de daoqian" (The Apology from the Zhungar Khanate to the 1717 Event). *Sibei minzu yanjiu* (Research in Northwestern National Minorities)(4)2015.

Qingdai junjichu manwen aochadang and the Qinghai Study

CHIA N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Central College; chian@central.edu)

Abstract: The existing studies of *Qingdai junjichu manwen aochadang* (*The Grand Council Archive of the Zunghar pilgrimage to Tibet*)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court, the Zunghar and Tibet. A close read of this Archive with attention to the Qinghai history leads to the conscious that all of the three Zunghar pilgrimage journeys to Tibet had Qinghai as the critical outpost inside the Qing territory. How the pilgrims proceeded here decided the success, or not, of the whole pilgrimage process. If we agree with the argument that the three Zunghar pilgrimage event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fundamentally affected the final formation of the Qing fanbu system (the non-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frontier regions), Xining as the Qing center of the pilgrimage management and Qinghai as the receiving hub of the pilgrims were crucial to this formation. The Aocha Archive has thus enhanced our knowledge of Qinghai as a unique region in the Qing frontier affairs.

Keywords: the Zunghar pilgrimage to Tibet, the Lifanyuan Vice Minister Yubao, the Grand Minister Resident of Xining, Trade in Dongke'er, the Qinghai Study